

试谈中西海洋文化的比较

---- 从郑和下西洋说起

汪品先

(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, 上海 200092)

美洲是郑和发现的吗?

新世纪开始爆出的一则新闻, 引起了国际规模的轰动: 2002年3月, 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舰长孟席斯 (Gavin Menzies)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, 提出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。孟席斯的报告立即向全球转播, 他的专著《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》[1]也一版再版, 热销各大洲。正在筹备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的国人, 对此当然备加关注; 但是首先产生的问题是: 这是真的吗?

孟席斯舰长本人不通中文、也不从事历史专业, 并没有掌握任何直接证据; 然而他认为郑和舰队不仅抵达非洲东岸, 而且还绕过好望角、横渡大西洋、发现过美洲新大陆。如他自己所说, 他的思路来自几十年航海家的感觉: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一张十五世纪老地图给了他启发。落款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海图, 准确地表示出欧洲的岸线, 海中几个岛屿名称古怪, 孟席斯判断这正是美洲加勒比海的波多黎谷和瓜德罗普岛; 而在1424年之前, 无论欧洲或者阿拉伯国家都没有能力远航美洲, 世界上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明朝的郑和船队。顺着这条思路, 他又去收集了种种证据。然而建立在这种“逆推”或者“反证”基础上的惊世骇俗之说, 当然大有争议。

本文无意、也没有资格去讨论孟席斯假设中的种种论据, 只想以此作为由头, 探讨一番东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, 作为六百年后的历史回顾, 既值得国人引为骄傲, 也有必要从中提取经验教训。力求通过分析, 能够得出一些对当前振兴华夏有用的认识。

古代中国的航海优势

其实, “中国人发现美洲”之说, 并非孟席斯首创。据报道, 二个半世纪以前, 法国一位汉学家就曾在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提出, 元朝文献中的“扶桑国”就是墨西哥; 据说距今十五个世纪以前, 中国和尚慧深就到过加拿大, 这比郑和早了近千年[2, 3]。但这还不算早。从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和陆上发现的土墩文化, 到秘鲁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, 都曾经引发过“殷人东渡”的推论, 说明三千年前中国殷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[4]。当然, 所有这种种说法还都只不过是推论, 缺乏确凿的证据。至于“哥伦布发现新大陆”, 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非议。说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也不光是中国人, 比如北欧的维京人据说在十一世纪初就到过加拿大[5]。应该说, 美洲自有土著居民, 无须谁去“发现”; 西方语汇里的“发现”, 指的是西方人开始“开发”美洲。即便证明了中国人早就到达了美洲, 也不能改变这片“新大陆”是欧洲人、具体说是哥伦布到达后才开发的事实。如果说, 这种“开发”至少在早期纯属掠夺, 那么这“开发”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词, 也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。

有趣的是: 为什么总有这种声音, 而且是来自海外的声音, 说中国人早就到过美洲? 其原因还在于历史上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。中华民族有过悠久的

航海史，和长期世界领先的海上技术优势。孟席斯的推想，不能说全无根据：十五世纪以前能够在世界大洋作大规模航行的，确实还只有中国。诚如李约瑟所说，“约西元 1420 年，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，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，乃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，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”。想象一下六百年前，郑和两万多人、三百多艘船的巨大船队，领队的宝船又是长逾百米、至今还是最大的木质船，一旦出现在大洋岛国，怎不令人目瞪口呆，惊以为奇迹天降[6]？

明朝的航海优势，是中国长期航海技术的继承和发展。早在 3 世纪，孙吴的海上商船就长达 60 米，孙权曾派遣康泰、朱应率强大船队穿越南海出使扶南（柬埔寨），也曾派卫温、诸葛直率万余人的舰队到达夷州（台湾）[4]。12 与 13 世纪之交，南宋水师控制了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，船只多达 6000 艘，曾在山东半岛外海击败了金国的大舰队。而 13 世纪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壮观，马可波罗到泉州港时就看傻了眼[6]。种种的历史记载，展示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优势；海外的出土文物，也不时发现中国古代航海远征的踪迹，使我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奇迹兴奋骄傲。

但是，郑和之后没有郑和，鸦片战争从海上打来，这也都是事实。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，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关键问题：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，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？为什么中国会放着海上的优势不用，结果从海洋上发展起来的是西方，从海上开始吃败仗的是中国？回答这些问题，最容易的切入点就是郑和下西洋本身：和将近一个世纪后西方“地理大发现”的航海相比，两者的区别在哪里？

两类不同的航海

郑和下西洋，本来是盛极一时、炳彪千古的历史壮举，不料 1424 年明成祖朱棣一死，新皇帝就下令“下西洋诸番国宝船，悉皆停止”。尽管在又一个新皇帝宣宗手里，郑和还组织了第七、也就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，但紧接着就是彻底的海禁，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，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。盛极而衰，嘎然而止，一场叫人看不懂的突然变化。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，至今见仁见智，多有争论。如果说，下西洋的原始动机在于朱棣要寻找政治对手、侄子朱允炆的下落，那确实早就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；如果说，当时朝中对于下西洋的争议，反映了明朝宦官集团与儒家朝臣之间的矛盾，那历次下西洋确实都是在宦官领导下进行的。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，是在于国家的财政。

六百年后回顾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。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，促进了海上交流，提高了航海技术，推行了和平外交。然而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、缺乏经济考虑，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。朱棣不惜一掷千金，换取大明皇朝的国威，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：以“雄主之野心，欲博怀柔远人，万国来同等虚誉，聊以自娱耳”。这种“赏赐”航海，最后导致“库藏空匮”，难以为继。固然，下西洋的确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，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，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。。。；但是这种“朝贡贸易”的特点在于“厚往薄来”，无论采用“贡品”与“赏赐”形式的商品交换，或者用高价购入“番货”，这类“随贡互市”并不要求等价交换，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，算的是政治帐，不是经济账。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，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，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，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，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[6]。所以说，

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、弘扬国威的措施，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，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。

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。就在郑和之后，葡萄牙王子“航海家亨利”(1394-1460)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，为后来葡萄牙达·伽马绕过好望角、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。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路，结果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哥伦布与国王订有合同：新发现的领土归国王和王后，所得金银财宝10%归哥伦布并且免税[7]。结果，“地理大发现”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，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。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：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，而中国却只从政治出发。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过于突出政治，过于忽视经济，这样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续性。百年前梁启超提出的问题：为什么“哥伦布之后，有无数量之哥伦布，维哥达嘉马以后，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。而我则郑和以后，竟无第二之郑和”？答案看来就在这里。

纵观欧洲历史，国王、海盗和海外商人本来就是三位一体，探险的航海本来就预期着暴利。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“发现”，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，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；但是另一方面，没有经济基础的突出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，不加分析的歌颂恐怕也是不适当的。而这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病，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晚期，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太大，决不能再掉以轻心。今天，我们无疑应当谴责“地理大发现”家们的贪婪残忍，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。但是在尺度的视野里，必须承认是欧洲人的“大发现”导致了美洲的开发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；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、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，但是很难说对全球有多么重大的影响，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说不上新时期的开创，以致需要今天来大声疾呼，加以弘扬。

事过六百年，最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在海上征服世界的开始，恰恰发生在郑和下西洋后不久？明代的中国，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。然而“不到一百年，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，。。下令自我毁灭。为什么？”[6]这里美国人提出的，是一个任何人都都会问的问题。如果透过历史的细节，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着眼，那么答案就应当从华夏文明的起点上去寻找。

两种文明的起点

两种不同的航海，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。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，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。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，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，欧洲第一个城市不是在大陆、而是在克里特岛上出现。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，岸外众多的小岛，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。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，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，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[8]。当然这些亚非的古文明，也都有其海洋成分的一面：几千年前，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汉河比较多，不像现在只有两条，而且还有河道与红海相通，因而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条件[9]。波斯湾西北端当时也比现在的范围大，两河流域的文化濒临波斯湾发展，问题在于其发展的方向。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，也能达到黄、渤海岸，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，统一六国的是黄河中游的秦国而不是下游的齐国，结果重心在中游而不在下游[10]。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，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，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、三千年历史

走向的差异。

以河流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，是一种农业文明，当时的中国的自然条件，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，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，决无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。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，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，“父母在，不远行”，并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。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：“四方诸夷，皆阻山隔水，僻在一隅”，“得其地不足以供给，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”，何苦要去海外殖民？至于对外贸易，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，因为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”（乾隆 58 年致英王敕谕）[7]。帝皇的观点，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，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。

古代中国社会“内向型”性质的重要原因，在于其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性。向欧洲介绍元朝中国盛况的“马哥勃罗游记”，所以能激发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兴趣，原因在于当时东西差异之大。只有海外前来有求于我，我们无求于海外。就是海内也一样，相对于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来说，沿海地区只是“蛮夷”之地；对于平原狭窄沿海山地，趋向于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，自然而然地被视作“另类”。比如粤东地方，“以船为家，以捕鱼为业”的“蛋户”“就被列入“四民之外”的“瑶蛮之类”，属于化外之民。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，只要有政治需要，就可以实行“海禁”，甚至像 17 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“迁海”，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。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、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上面所述，决不是说华夏文明属于与世隔绝、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。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，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，儒释道可以三教合一，这从西方文明的角度看来是难以理解的。汉唐盛世，中国的首都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都会，也是吸引四海前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国际中心。“留学生”一词的由来，就是指日本“遣隋使”、“遣唐使”带来，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人员的称呼。政治上，从汉朝开始对外派遣政治使节，通西域的西汉张骞、东汉班超，或者出使罗马帝国（大秦）的甘英，对于中亚地区的交通发展和文化交流，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；宗教上，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，或者东渡的鉴真，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亚洲文化的交流史上，也都起了奠基的作用[4]。

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：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，却主要不是中国人。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，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。丝绸之路上古代欧洲和中国的贸易，主要地通过中间商人，如西域人来进行的，其中包括来自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“粟特商团”，即安禄山、石敬瑭祖先的“昭武九姓”[11]。其中许多人后来融入了中华民族，但至少不能代表重农轻商华夏文明的主体。这就是说，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，但他们是凤毛麟角，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；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，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，始终认为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，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的必需。谈到这里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，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

当我们说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，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时，立刻就会有人举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众多记录，否定这种区别。其实如上所

述，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，是不容否认的；但这决不能证明海洋成分曾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。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分歧，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世界文明发展途径的多样性，了解还有所不足。

前面说过希腊文明源自爱琴海，其实西欧后来的历史，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以海洋为中心展开。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，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，都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分布的，海就在中间。中国历史上苦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而欧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欧海上的维京人，从 8 到 11 世纪维京人的海盗征战，改写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。14 至 17 世纪，在欧洲垄断贸易、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汉萨同盟 (Hanseatic League)，也是以德国北岸的卢贝克港为中心，由围绕波罗的海的城市联合而成的。我们对于欧洲文明首先是从洋炮和洋货开始认识的，对于这种文明如何围绕海洋发展起来的历史，大家都比较陌生，也不大清楚这与古代中国围绕大河流域、在大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文明，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差别。

比如战争，战争作为历史之曲的最强音，很能反映出这种区别。在以古希腊为起点的西方文明中，海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荷马史诗记载特洛伊木马的故事，是传说中古希腊战争最脍炙人口的一段，现已证明属于史实。希腊军队围攻特洛伊城十年不下，最后用木马计破了城。然而，这场大战是跨海之战，希腊方面动用了上千条战船攻打特洛伊；而攻陷特洛伊的英雄奥德赛，在归途中又在海上飘泊了十年。这与中国历史十分不同：著名的涿鹿之战，黄帝与炎帝部族与蚩尤部族争夺中原地带，是发生在河北涿县一带典型的陆战；而我国著名的水战，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，是发生在长江中游的江上之战。其实一部欧洲发迹史，整个溅满了海战的鲜血。英国就是在十六世纪打败了西班牙“无敌舰队”，十七世纪英荷海战夺取荷兰海上贸易的垄断，才建立起海上霸权的[5]。

每个古老民族都有洪水的传说，这些传说也都带有不同文明的烙印。“圣经”里“诺亚方舟”的故事，是基督教文明的洪水故事。近年来，美、俄两国学者合作研究，在黑海陆架取得 250 个以上的沉积柱状样，发现是冰期以后地中海海面上升，远远高于当时还是淡水湖的黑海湖面，距今 7600 年前海水终于突破博斯普罗斯海峡灌入黑海海盆[12]，而这正是“诺亚方舟”传说的原型[13]。我国历史上的夏禹治水，说的是河流流域的大洪水，正反映了我国文明的特色。而《旧约》里涉海的故事并不以诺亚方舟为限，“出埃及记”里的渡过红海，“约拿书”里的海上风暴，都属此例。两者相比，也正是中、西方文明差异的一种表现。

大陆型与海洋型文明的差异，同样反映在古代地理学的不同。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（466-或 472-527）的《水经注》记述了 1252 条河流，是水文地理的经典著作，这些都代表着大陆文化在地理学上的辉煌成就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（1586—1641），北起燕、晋，南至云、贵、两广，遍游名山大川，考察地质地貌，水文、植物，虽然也曾到达海边，而其目标还是在山川。相比之下，西方的经典学者如德国的亚历山大·洪堡德 (Alexander von Humboldt, 1769-1859) 在秘鲁考察，就发现和测量了南太平洋的东部边界流—秘鲁寒流，也称为“洪堡德海流”；美国革命家本杰明·富兰克林 (Benjamin Franklin, 1706-1790)，在 1770 年第一次绘出了墨西哥湾湾流图[14]。近年来，我国也越来越多地介绍古代航海的纪录见闻，从元朝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，到清朝谢清高的《海录》[15]，但重点都在海外岛屿的人文介绍，并不涉及海洋探测。海洋文明的概念，是西方与我国传统地理学相区别的一大特色。

两类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异

我们说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，只是指其主导作用的部分，决不是说以大陆为特色的华夏文明就没有海洋成分。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，首推2200多年前的徐福下东洋。但这种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航行，很难说是海洋文明的标志。纵观历史，华夏文明里的海洋成分始终只是作为插曲和补充出现，难以形成主流，而且这种传统贯穿至今。时间上看，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、走向海洋的壮举，却只能昙花一现，以悲剧告终，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于海洋文明的容忍度。空间上看，沿海地区几千年属于“蛮夷”之地，从沿海多山地区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，长期被视作“另类”，属于化外之民，不受政府保护。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，只要有政治需要，就可以实行“海禁”，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“迁海”，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。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、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可以举出数不清的实例，证明中国古文化中有丰富的海洋成分[16]；但是难以证明这是华夏文明的主流。比如战国时期邹衍的“大九州说”，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，只占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，反映出沿海的齐国文化中，对于空间广阔性的认识。管仲、邹衍的观点的确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，但统一六国的是代表内陆文明的秦国，不是齐国[11]；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是儒家，不是阴阳家。

与此相应，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。在内向型的中国大陆古文明中，海洋常常作为一种抽象或者负面的因素出现，通常与蛮荒、甚至灾难联系在一起，连神话都不例外。庄周《逍遥游》里的大海“北冥”、“南冥”，及其中可以互相转换的“鲲”和“鹏”，无非是极言其大，并无具体所指，属于哲学的议论而不是自然的描述。《山海经》的“海经”“荒经”也是指遥远的极边地区，重点在于怪诞事物，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内容莫过于“精卫填海”故事：炎帝女儿在东海溺死后，变为“精卫”鸟，“常衔西山之木石”想把东海填平。几百年以来，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“妈祖”，便是传说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，成仙后变为海难的救星。因此，这里有抽象的、哲理的海洋，也有具体的海洋，但是具体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剧成分。

人们会说，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生动活泼的海底故事：《封神榜》里的哪吒闹海，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闹水晶宫，既不抽象，也不是悲剧。然而，这些想象中的海底世界，与陆地并无区别，孙悟空打进东海的水晶宫，照样献茶喝酒，看不出有海水的模样；而哪吒大闹龙宫，手持火尖枪、脚踏风火轮，更与陆上没有两样。明朝《东游记》讲八仙过海，也有火烧龙宫，“铁拐、洞宾放出葫芦之火，..须臾之间，东洋火炽，竟成一片白地。”这些神话里的海洋，只是把陆地搬到了海底，是一种抽象的空想产物。古希腊神话里也有众多有关海洋之神，从海神 Poseidon 到 Oceanus 与 Tethys 夫妇，而这类神话往往具有实际航海生活作为基础，不只是凭空的想象。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舍伦(Siren)女妖，这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，用甜美的歌声蛊惑航海者溺死，正反映了爱琴海区日中太阳可畏，在“无风的沉静”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险[17]。同样十九世纪法国的凡尔纳(Jules Verne)，如果没有海洋知识，根本不可能写出像《海底两万里》那样的科幻小说，而且这种小说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产生。

从具体的人物身上，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出两种文明的区别。建立了横跨欧、亚、非三洲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(公元前356~前323年)，比秦始皇

(前 259~前 210)差不多早一世纪。两位都是创有统一大业的旷古伟人,但是对于海洋却态度各异。秦始皇尽管也曾“东临碣石”,还派遣徐福东渡求仙,但他的兴趣在山不在海。亚历山大大帝却总是向着远方未知世界,去发现新土地、去探寻新海域,不仅曾经派遣舰队考察阿曼海、波斯湾和红海,临终前还安排人去考察里海是否同黑海相通,而且身体力行,传说曾经亲自潜入海底进行观察[8]。我们也可以举艺术家进行比较:明朝的苏州才子、画家唐寅(1470-1523)和意大利的达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, 1452-1519)属于同时代人。唐寅的山水画和仕女画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极品;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达·芬奇,却不仅是艺术家,同时又是发明家、科学家。他笔下的大洪水具有流体力学的内涵,它的人像和马像都具有解剖学的基础,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潜水服的设计图,直接为探索海洋做出贡献[18]。

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学术界,重视实践、亲自动手,与长期沉湎在科举制度下、只注重“务虚”、不重视“务实”的中国学术界,形成强烈的对照。值得指出的是海洋的观察,十六世纪瑞典 Olaus Magnus 所作的北海海图 *Carta Marina* (1539 年),不但表示了海岸与海洋动物,而且所画的海冰的分布与涡流也被现代的遥感观测所证实,具有高度的科学性[19]。对海洋的兴趣,也反映在现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,美国老罗斯福总统(Theodore Roosevelt, 1858-1919)参加过海洋深潜器的设计,虽然他的方案未被采用。近代史上,东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为特色,1975 年裕仁天皇参观美国 Woods Hole 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潜技术;1987 年,当时的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,并且还钻进了 Alvin 号深潜器[20]。

历史的反思

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,本来各具特色,并无优劣之分。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势,却是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大:海洋从提供“鱼盐之利,舟楫之便”,发展到今天的“海洋世纪”,海洋成为未来能源与资源的宝库,和各国权益之争的焦点;世界各国也从“自给自足”发展到“全球经济”,海洋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。说到底,人类虽然在陆地上生活,而现代地球上的几片大陆相互间远隔重洋,人类社会越是全球化,海洋的作用也越大。这与两、三亿年前,全球只有一个“联合大陆(Pangaea)”的时期大不相同:如果那时候产生人类文明,显然大陆文明会比海洋文明更具优势。

应当承认,中国长期以来对海洋的忽视,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:古代史根源,因为起源在河域而不是海岸和海岛;近代史根源,在于几百年的主动“海禁”;现代史根源,则是上世纪中以来遭受封锁,几十年的被动“海禁”。我国历史上长期忽视海洋,直到洋炮从军舰上把我们轰醒,仍然没有改变“以农立国”的大陆性内向性质。由于长期重陆轻海的习惯,导致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,总以为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;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,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,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,“家门口还弄不好,跑老远去干吗”,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。海洋观念的薄弱,同样影响着文教战线,在地球科学的“海(海洋科学)陆(固体地球科学)空(大气科学)”三军中,我国以“海军”为最弱。连中学地理教材,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。

东西文化差异,是中国知识界的百年话题。当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时,惊人地发现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。本文从海洋文化的比较着眼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,重点在于探索我国长期忽视海洋的深层次原因,因此谈到负面的内容比正面的多,但决没有“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威风”的意思。更不想把我们今天的缺陷推到祖先头上,如鲁迅先生嘲笑的,烂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。

而是相信，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，相信高尔基的话：意识到自己是傻瓜的人，就不再是傻瓜了。海上落后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甘心落后，或者不承认落后，能够发展的时候也不去发展。由于对海洋的漠视，六百年前我们曾自毁水师，将海上优势拱手让人，直到今天还在尝其苦果；六百年后的今天，如果我们讳疾忌医、依然故我，会不会重蹈覆辙，再一次丧失历史的良机？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Manzies, G., 2004. *1421--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*. Perennial, 650 p.
- [2] 贺志雄 保惠红, 2000.《无言的慧深---谁先发现美洲》。云南大学出版社, 178 页。
- [3] 马南邨, 1961. 谁最早发现美洲。转载于《燕山夜话》，1979, 北京出版社。
- [4] 王介南, 2004.《中外文化交流史》。书海出版社, 478 页。
- [5] 秀娥、张翅, 2005.《海盗地图》，花山文艺出版社, 353 页。
- [6] Levathes, L. (李露晔)著, 邱仲麟译, 2004. 《当中国称霸海上》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48 页。
- [7] 倪键中(主编), 1997. 《海洋中国》，中册,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509-1121 页。
- [8] Toynbee, A. (汤因比)著, 徐波等译, 2001. 《人类与大地母亲——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》。上海人民出版社, 584 页。
- [9] Silverman, D.P., 1997. *Ancient Egypt*. Duncan Baird Publ., London, 255p.
- [10] 周振鹤, 1995. 假如齐国统一天下。转载于周振鹤, 1999, 《学腊一十九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, 225-239 页。
- [11] 荣新江, 2001.《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》。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490 页。
- [12] Ryan, W.B.F., Pitman, W.C.III, Major, C.O., et al., 1997. An abrupt drowning of the Black Sea Shelf. *Marine Geology*, 138: 119-126.
- [13] Ryan, W.B.F., and Pitman, W., 1998. *Noah's Flood.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bout the Event that Changed History*. Simon & Schuster, London, 337p.
- [14] Gross, M.G., 1987. *Oceanography, A View of the Earth*. Prentice-Hall, 406p.
- [15] 谢清高著, 安京校释, 2002.《海录校释》。商务印书馆, 347 页。
- [16] 宋正海, 2005.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。《自然杂志》, 27 (2): 99-102 页。
- [17] 劳斯(著), 周作人(译), 1998. 《希腊的神与英雄》。海南出版社, 317 页。
- [18] Bellone, E., & Laurenza, D., 2000. Leonardo: Künstler, Forscher, Ingenieur. *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, Biographie I*. 1-105.
- [19] Rossby, H.T., and Miller, P., 2003. Ocean eddies in the 1539 Carta Marina by Olaus Magnus. *Oceanography*, 16(4): 77-88.
- [20] Broad, W.J., 1997. *The Universe Below – Discovering the Secrets of the Deep Sea*. Simon & Schuster, London, 337p.